



威權時代終結及歷史的新開端

——十年來的台灣政治民主回顧

◎胡文輝

十年前的一月十三日，台灣進行有史以來最大最重要的一次權力轉移，國家領導人蔣經國總統過世，由副總統李登輝繼位。權力的轉移牽動改革的巨輪，長年被威權僵固住的台灣活力開始解放，一項劃時代的改革工程從此展開。

十年來，台灣進行了最大的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文化變化，台灣如何走過關鍵的十年？李登輝總統如何領導台灣走過十年關鍵年代？宏觀十年台灣的變貌，才能比較看清楚台灣的變化，以及據以評論台灣的領導者李登輝主政十年的歷史功過。

一九八八年到一九九八年的十年裡，是台灣意識對抗中國意識，民主意識對抗威權統治，人權意識對抗壓制力量等的決戰，可以說是台灣的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文化的「解放之戰」，台灣政、經、社、文力量的解放，影響及於台灣各個層面，不只是上層結構的變化而已，如果要深入解析十年台灣變貌，當然不能只從政治上層結構的轉換來觀察，不能只看領導者的所做所為，不能一如過往中國歷史只著重的君王大事紀。

十年來的台灣，已從威權統治首度演變為民主政治及平民社會，要觀察台灣，除了上層的

政治演變外，必須也從台灣意識的社會現象等平民社會的變化來比對。例如，台灣語、台語歌曲的流行，台灣文化、台灣研究的獲得重視等等，「雖是小道，亦大有可觀」，因為這些都是台灣主體意識歷經長年壓制、經過抗爭努力，終能興起的一部分具體象徵。

台灣意識出頭天

檢視十年來台灣的變革歷程，平民社會勃興的力量，是政治民主化變革的重要依託，而政治民主化則提供了平民社會開放的空間。因此，「台灣意識出頭天」雖不能只以政治權力結構的轉換來含括，但政治權力的轉換則是台灣意識終能走出長年被壓抑悲情，解除平民社會受政治禁錮的要項，並是台灣變貌中最外顯的變化，因此，觀察十年台灣變貌，仍必須以政治權力結構的演變為主軸。

台灣的政治演變，可以十年來台灣的領導者主政的大政方針走向，推動改革過程中曾面對的反對異議，並引發攻防對抗，及潮流趨勢變化等來顯現十年台灣的改革歷程。

十年來，台灣的領導者都是李登輝，因此，這十年可泛稱為「李登輝時代」，取其簡單、

◎本文作者為自由時報副總編輯。



易記、有代表性而已。「李登輝時代」的改革工程，主流的看法是「和平革命」或稱「寧靜革命」，但來自兩極的批評者則有不同的評價，激進改革者認為李登輝未能掌握住改革時機，磋砣改革歲月；另有人則認為李登輝以一己之意，帶著台灣往前衝，愈改愈亂，尤其是與中國漸行漸遠。前者主要是台灣獨立的激進路線者，批評李登輝未能明確、即時把台灣帶向獨立之路；後者則是統派人士，認為李登輝的路線是「獨台」、暗獨。

台灣的李登輝時代三階段

回顧台灣過去十年歷程，「李登輝時代」大致可分為三階段，第一階段可稱「李登輝前期」，權力不穩是李登輝面對的內在環境，「政爭」風浪是這個階段的波濤，改革不能走直路，而形成曲曲折折的坎坷路。第二階段可稱「李登輝高峰期」，大致可從郝柏村下台起到去年總統首度民選之後，做為本階段的前後劃分線，李登輝的權力已能有效掌握，除了人事決定權，政策上的外交出訪、修憲等國家大政，李登輝雖仍遭逢保守派的抵抗，但大致都能貫徹意志推動改革。第三階段可稱「李登輝還原期」，可從一九九六年十一月起，國內治安接連發生三大刑案做起點，跨過現今的種種，並將延續到兩年多之後任期屆滿。

過去十年裡，台灣的政治從威權到民主、社會從封閉到開放，人民得以免於受到政治統治

暴力鞭笞的恐懼，多元異議的聲音不再受白色恐怖威脅而綻放，但台灣社會也因轉型而失序，社會亂象也頻生。這些變化，不論是正面的、負面的，並非李登輝一人所能成，也非一人所能毀，但這正是李登輝掌台灣的國家大政下走過來的，成敗自應算在李登輝時代的歷史中。

台灣情結與李登輝情結

再以所謂的「李登輝情結」曲線演變來做交互驗證，李登輝情結的興起可從十年前接任起，迅速達到高峰，一直維持到去年才退潮逐漸還復本原，即所謂「李登輝情結退潮」。這項曲線變化，正與台灣的改革相應和，當改革的期望高漲時期，正是李登輝情結的高潮期，當改革已近完成，人民的期望不再只加諸李登輝一身之時，李登輝情結即退潮，因此，「李登輝情結」其實正是「台灣情結」的化身，李登輝以台灣人第一位總統，被賦與台灣人出頭天的多少期待。其實，我們如以「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各領風騷三五年」來看李登輝情結，李登輝聲望在走向民主化的台灣，能維持近十年的高檔，已屬十分特殊的例外，何況，台灣的所謂「政治明星」，旋起旋落更是常見，在台灣歷史發展中，李登輝這樣的角色，過去不會出現過，未來也很難再現。「李登輝情結退潮」的內涵正是「台灣意識」普遍化、深度化、多元化的結果。



歷史不能重來，我們無法從「是李登輝」與「不是李登輝」的結果，來對照比較台灣發展的好壞，但是，我們仍可從「李登輝路線」的幾個重要面相，並把「反對李登輝路線」做為反面的印証，從而使真相更能呈現，並可驗證當年蔣經國總統選擇李登輝這項事實對台灣的影響，再來檢証台灣十年民主化歷程。

「李登輝路線」的重要內容，可從政治民主化、大陸政策、外交拓展等來呈現，並以「挑戰李登輝的路線」做為反面鏡子，兩相對照。

政治民主化是李登輝十年來著力最多、但也是爭議很多的。台灣的政治民主化有三大指標，一是解除戒嚴，二是國會全面改選，三是總統直接民選。戒嚴雖在蔣經國任內解除，但真正的「解嚴」使台灣政治社會解除威權桎梏的束縛，則在李登輝任內完成；國會問題，在蔣經國主政晚年才提出，而且還只是所謂「國會改革」而非「國會全面改選」，國會全面改選在李登輝主政三年後才實現；總統直選則是李登輝任內推動、完成的。

改革不是天上掉下來的

戒嚴的解除影響政經社文各方面，在政治上，美麗島事件的平反、二二八事件的平反、白色恐怖的平反等「三大平反」是重要象徵，前二項已大致完成，白色恐怖平反則尚待努力。國會全面改選，則是台灣政治民主化的第一個里程碑，一九九一年「第二屆」國民大會

代表改選、一九九二年「第二屆立法委員改選」，台灣人民數百年來才第一次選出自己的國會，國會才第一次能代表民意。一九九六年三月的首度總統民選，是台灣政治民主化的另一重要里程碑，主權在民或稱國民主權原則才首度實現，台灣才堂堂正正的列入新興民主國家之林。

當國民黨內為總統直選爭議不休時，當時反對總統直接民選的非主流派及媒體曾以「天上掉下來的總統直選案」來指責李登輝，今天回顧當年事，卻正可反證台灣的政治民主不是天上掉下來的，而是多少人士百折不撓努力才有今天。

台灣的政治民主得以建構，不論從「中國人五千年」或「台灣人四百年」歷史來看，都是重要的歷史大事。正如世界知名的政治思想家杭廷頓論第三波民主化，比較台灣與新加坡時所言，台灣的民主制度建構，短期內雖紊亂，但在未來將屹立不搖，而新加坡的人治，雖短期間展現效率，但長期則恐將傾頹。

台灣如何走過關鍵十年

一九八八年到一九九八年是台灣發展的關鍵十年，我們可以「李登輝時代」的權力轉換與制度建構之間相互影響，來重頭檢證台灣如何走過關鍵的十年。

改革與反改革之爭的一道波浪——垂簾聽政



「李登輝前期」的權力不穩情況，首先遇到的第一個難題就是兼任國民黨主席之爭。當時蔣中正已過世十三年，但蔣家當權威勢仍在，蔣宋美齡一紙書信透過蔣孝勇傳達到長期追隨蔣家、有若蔣家家臣的行政院長俞國華、國民黨秘書長李煥等手中，竟曾造成黨主席兼不兼的難題，還要其他「家臣」抱著戒慎恐懼，以及演出所謂「臨門一腳」，才推出已繼任總統的李登輝兼黨主席。這段過程正顯示李登輝當時有位子而無實權的危局；而如不兼黨主席，則無力推動改革的情況，也正可反証當時國民黨長年統治下的荒謬。

其實，那時除了蔣家仍不願放手而想玩「垂簾聽政」的宮廷老把戲之外，所謂「國民黨諸大老」也有以李登輝為傀儡，權則由諸大老集體領導的想法，這可以由一九九〇年政爭時，所謂「八大老」出面斡旋時曾傳出的「條件說」做為印証，非主流的郝柏村、李煥、蔣緯國等人正是想要集體領導，而郝柏村所代表的軍系力量，竟敢介入政治斡旋，更可顯示李登輝權力不穩的實況。

第二道波浪——軍隊退出政治與郝柏村事件

不過，從郝柏村的興衰，以及軍方力量退出政治，情治單位的社會控制退潮，則正可顯示軍隊回歸專業本位是台灣政治民主化的成功因素之一。

「郝柏村事件」從其久任參謀總長，培育嫡系人馬，到轉任國防部長，仍軍權一把抓，到政

爭高潮時，挾其「實力」得以出任行政院長，郝柏村代表的軍權在強人蔣家之後，勢力達到最高峰。並在統派強勢媒體的助陣造勢之下，形成尾大不掉之勢。

但在台灣民主化的浪潮之下，原統治階級以郝柏村軍權為核心所構築的「非主流威權堡壘」，仍然被沖破，在反軍人干政、在野黨抗爭、國會全面改選，台灣本土力量成為國會多數之下，郝柏村不得不下台，軍事將領回歸其專業領域而獲得尊重，也免除了軍人干政台灣民主走回頭路的危機。這是台灣政治民主化渡過的一個巨大浪花。

改革—反改革的第三道巨浪——國會全面改選

「國會全面改選」是台灣政治民主化的一個巨浪，「萬年國會」是舊統治階級的另一重要橋頭堡，因為這是郝柏村、李煥、梁肅戎等舊統治階級的權力保障，也是第二代年青即能進入高位的主因，如陳履安、宋楚瑜、馬英九及新國民黨連線等人，雖其「個人條件」不錯，但年青不須多少奮鬥、表現，即能進入高位，則主要是「背景」佳，獲有統治階級庇蔭而被培育為權力的接班人。

中國大陸一九四八年前選出的「萬年國會」既為統治階級的橋頭堡，「國會全面改選」就成了改革—反改革的攻防重心，萬年國會也就成了非主流全力捍衛的堡壘。這一戰從一九八〇年代打到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，四十四年沒改選的所謂「資深」立委、國代，領取



數百萬元退職金退職，才告終。留下的是台灣政治民主化的斑斑歷程。

馬英九最近曾說，蔣經國在國會改革「可以拿一百分」，但証諸國會全面改選攻防過程，可以清楚證明這絕不是事實。蔣經國晚年曾提出五大改革，其中有一項是「國會改革」，國會必須要改革，是內外的主客觀因素催迫使然，並非國民黨舊勢力主動要改革。內在因素方面，四十四年沒改選的萬年國會，那時已垂垂老矣，而且快速謝世，被迫補充新人。在一九九〇年，「逼退老賊」風起雲湧形成社會運動時，有位老立委在面對「逼退」時曾口出：黃泉路上有老有少，誰先死，不知道！的厲言，可見這些既得利益者抗拒改革之烈。

外在環境上，台灣民主化的浪潮已勃興，早已不具民意基礎的萬年國會，已成為社會上打倒的首要目標，甚至可能成為人民革命的導火線，而迫使國民黨舊勢力不得不放棄這個堡壘。

更重要的是，蔣經國時代提出的是「國會改革」而非「國會全面改選」，而舊統治階級在蔣經國過世之後，仍圖利用萬年國會的「殘值」，以拖延改革時間。這就是馬英九所謂的一百分！

國會全面改選攻防戰，在國大、立院都留下斑痕，也成為台灣民主化的歷史軌跡。為了反對萬年國會，在老國大抗拒改革演出「山中傳奇」之下，學生自發性的「三月學運」在一九九〇年波瀾壯闊的展開，抗議「老賊」修憲，才打破政治壟斷的威權舊勢力堅城。「老賊」

一詞正式公開使用，則出自當時民進黨立委朱高正（現為無黨籍）之口，而立院更是時時烽火漫天，院內是台灣選出的反對黨立委發動逼退，與梁肅戎等指揮的警力肉搏戰；院外則天天集結抗議萬年國會的群眾，與警方街頭游鬥，汽油彈與警棍齊飛。

而統派強勢媒體及電視台，則成為威權舊勢力的幫凶，故意擴大場內外的肢體衝突事件為「暴力」，卻無視於抗爭是為爭民主的本質。

改革—反改革第四道巨浪—總統直選與委選之爭

總統直選是另一民主歷程的浪花，而以一九九二年三月的國民黨三中全會爆發「直選-委選」之爭為高浪。歷經多次修憲的直選派與委選派抗爭，到一九九六年三月總統、副總統首度舉行直接民選，才告一段落，但直到去年修憲凍省之爭，改革與反改革之爭仍餘波盪漾。

回顧國會全面改選、總統直接民選二大改革工程，及歷次修憲、凍省之爭，可以顯現反改革者的二大反攻主軸，一是在意識形態上把改革打成「台獨」，二是策略上藉體制之爭來做權位之爭。

在國民黨統治階級及統派附庸媒體長年的抹黑之下，「台獨」被扭曲、被醜化，十年來，台灣進行民主改革，「被醜化的台獨」再次成為反改革者打壓台灣民主的武器，尤其是統派媒體及政治人物，以國會全面改選就是走向台獨、總統直接民選更與台獨劃等號，來反對台灣的民主化，去年的修憲主要是制度改革，但



反凍省的省府人士仍把凍省等同台獨。所幸台灣的民主是壓不扁的，台灣人當家作主的意識也是無法阻擋的，反改革者以台獨來打壓台灣民主，更常引「中共武力犯台論」來威脅台灣人民，但反而使台灣意識在反抗打壓、反對威嚇之下，漸漸得以彰顯。

藉體制之爭做權力之爭，是反改革者的策略，更是統派媒體打壓台灣意識的把戲。每當李登輝順應台灣民意潮流推動民主改革、開拓外交空間、廢除惡法（如原刑法一百條的言論判亂罪）有所舉措時，反改革的非主流派就藉喉舌媒體抨擊李登輝「毀憲擴權」，藉憲政體制之爭來做權力之爭。

這些國民黨舊統治階級的附庸媒體，在總統「姓蔣」的四十年裡，面對「總統獨裁」的事實，連「擴權」都不敢置一詞，何況「毀憲」二字？「獨裁」更是想都不去想，因為他們本就是獨裁者壓迫台灣人民的工具。

而且，這些媒體還曾在嚴家淦擔任總統、蔣經國任行政院長的短暫時間中，表示由蔣掌權是符合內閣制精神，但蔣經國當了總統，仍獨攬大權，這些媒體對所謂憲政體制屁都不敢放，只會稱頌總統英明。

這些媒體其實只看總統姓蔣或不姓蔣，是本省人或外省人，所謂體制之爭其實是「批李反台」的權力鬥爭工具而已。何況，非主流派既然反對國會全面改選、反對總統直選、反對民主改革，沒有民主，那來憲政？

二二八事件走出陰暗迎接陽光

一九四八年爆發的二二八事件，是台灣歷史上最傷痛的血淚一頁。在國民黨統治階級的軍事鎮壓及「清鄉」之下，台灣人民死傷數萬人，菁英幾乎死難一空。而且，恐怖鎮壓造成人民長期恐懼，父老兄長多年來告誡子弟「遠離政治」，政治成了社會禁忌話題，以求避禍。

受難者的家屬更被壓迫，只能躲在社會陰暗的角落長年暗自泣血。

到一九八八年結束蔣家統治之後，二二八事件才逐漸獲得平反，但原為舊統治勢力的反改革派則仍圖負隅頑抗，杯葛二二八平反。例如，一九九〇年時，立法院首度為二二八默哀，反改革派反對不成後，仍以不起立、離席、態度頑劣等行為語言拒絕；又如，立法院改選後通過二二八補償條例時，即因反改革派阻撓，拒絕為當年血腥屠殺認錯，而未能正名為「賠償條例」。

所幸台灣人民的力量已沛然未之能禦，政治上層結構也已轉換，政治力加上學術界的努力，終於使二二八事件走出陰暗，得到平反，歷史的真相得以呈現。

台灣民主化的歷程中，二二八事件的平反是具有重要象徵意義的歷史篇章。

憲政改革的坎坷路

再從修憲過程中台灣主體意識對抗中原殘存意識的一頁歷史。現行的「中華民國憲法」是



在中國南京制定的，但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才開始實施，一九四八年五月十日就制定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，後來又數次增加臨時條款內容，以為蔣家獨裁背書，憲法根本未曾實施就被放在一邊。

在台灣要走體制內改革時，憲政上面臨的是這樣歪七扭八、烏魯木齊的所謂憲政體制。反改革派捍衛的也正是這樣的一個橫加於台灣人民的超級大違建。

「拆除重建」是最好的方式，即依台灣人民的意願設計制定一部新憲法。但李登輝總統主導的憲政改革，走的是體制內的路線，自是易於受到反改革派的牽制，而使憲改之路曲曲折折，臨時條款雖拆除了，但憲法本文則不動如山，仍如一棟破舊的違建大樓蓋在台灣，一九九一年起的憲法增修條文則如在舊大樓邊蓋個可以棲身的房子，常常必須遷就舊大樓，又受到自稱舊大樓所有者的牽制需索，而難以如人意。

如一九九一年、一九九二年修憲進行國會改革時，就曾為所謂「大陸代表制」爭議，反改革派說是不如此無法代表全中國。九二年、九四年修憲進行總統直接民選入憲時，又碰到「委選」與「直選」之爭，反改革派全力反對台灣人民直接民選總統，又說是委任選舉才有全中國的代表性。到了九六年修憲進行凍省及中央政制建構時，反凍省的省府人士又重彈老調，說是台灣省沒有了就是切斷了與中國的連繫。

在體制內改革的坎坷路上行走十年的台灣民主，為了與反改革者對抗，已浪費了太多的時間，而且，在反改革者大扯後腿之下，憲政體制的建構其實尚未全部完成，總統與行政院關係、行政權與立法權關係、國民大會與監察院存廢、省府虛廢的落實、政府的再造等等，都待從憲法上、從立法上、從執行上實現為台灣量身訂製、適合台灣的新憲法、新政府。

制定新憲法是「改革尚未完成、台灣仍需努力」，將是後李登輝時代下一階段的重要改革課題。

◎